

刘 良 / 著

毛泽东



进退韬略

在命运转折关头

毛泽东“逼上梁山”/一份来信掀起的风波/
抵制李立三的命令/“弱者先让一步”/
与周恩来谈到天亮/不安的休养/到底谁的错/
“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决策者的违心决策/
把争论带往征途/李德的脸红了,又白了/
毛泽东的旗帜永远不倒

福建人民出版社

刘 良 / 著

刘良

在命运转折关头

进退韬略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再版编目（CIP）数据

进退韬略：毛泽东在命运转折关头 / 刘良著. -2版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1

ISBN 7-211-04319-9

I. 进... II. 刘... III. 毛泽东(1893~1976) -
生平事迹 IV. 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110615号

进退韬略

——毛泽东在命运转折关头

JINTUITAOLUE

刘 良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76号 邮编：350001）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厂址：北京市朝阳区下清河甲1号 邮编：100012）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1/32 13.625印张 4插页 276千字

2003年1月第1版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211-04319-9

A·17 定价：25.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好书永不寂寞

人类始祖蹲踞在篝火旁，将人与自然共处的方法、人类繁衍的秘密——口授给他的子民。后来有了文字，有了纸和笔，几千年口口相传的智慧便被记录在书中，流布市井村野，任世人同享文明的盛宴。

薪尽火传。书籍承载着人类的智慧，代代传扬。

信息爆炸的年代，选择变成一项艰深的工作，传播受到信息碎片的无情干扰。出版人的使命，便是了解你的索求，尔后请优秀的作者掌勺烹饪；便是把思想者的哲思，策划包装成色香味俱全的佳肴，摆放到你的面前。

在读者与作者之间，出版人用真诚架起了一座沟通之桥。

人生最精彩的片断并不一定是在他功成名就之时，而往往是在他身处逆境之际。一代伟人毛泽东，一生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也正是他屡遭排挤、屡受挫折而最终确立领袖地位的时期。这期间他面临无数次的命运转折，面临无数次的进退抉择。他大智大勇，进退有据，一次又一次地从困境中崛起。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奠定了他一生的基业。

读罢此书，方知何谓“韬略”，何谓“历史的选

择”，方从心底里冲起直面人生的勇气、豪气与胆气。

让好书陪伴我们一生，让我们的思想和心灵永远年轻，永不寂寞……

阿 正

进退之间

1927年，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一年。

4月12日凌晨1时，一队行迹诡秘的人突然冲进了上海闸北“工人俱乐部”的大门。这是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奉蒋介石之命策划指挥的一场对工人武装的突然袭击。仅仅3天，猝不及防的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就有300多人被杀，10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

四天后，广州军阀李济深、古应芬、钱大钧与蒋介石采取了策应的行动。他们派军队包围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广东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了黄埔军

校和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搜查和封闭了革命工会、农会，共产党人邓培、肖楚女、熊雄、李启汉、刘尔崧惨遭杀害。

5月17日，武汉发生“夏斗寅叛变”；同月21日，湖南长沙发生“马日事变”；……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也终于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在“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下，大批的共产党人倒在血泊之中。

刚刚燃烧起来的革命火种眼看就要被扑灭！

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共产党人的出路在哪里？

“靠山的上山，滨湖的上船”

“苏维埃是从革命的废墟上兴起的，它要赤手空拳从失败中斗争出一个胜利的结果来。”^①

8月的武汉，热得像火炉。

12日，一个身穿长衫的中年人，将手中的红纸伞压得低低的，迅速地穿过汉口的街道，进入小巷，最后来到汉水江岸的渡口。

他紧挨着排成长龙的旅客，一步一步往前挪动，登上了一

^①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140页。

艘南下的轮船，不见了。

“呜——”码头上响起一声气笛，轮船徐徐地离开了江岸。中年人忽地钻出了船舱，站在甲板上，目送着渐渐变得模糊的这座变幻莫测的闹市……

这位青年人，便是 34 岁的毛泽东。

此刻，毛泽东受党中央的派遣，以中央特派员的身分，前往他的家乡——湖南长沙，领导秋收暴动。

天气虽然很热，可他不敢脱下长衫。在内衣口袋里，右侧塞着几份用特效药水处理过的中共绝密文件：《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四省秋收暴动的每省具体工作》、《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左侧，放着他自己拟定的那份《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

毛泽东后来这样说：

“我被派到长沙去组织后来被称为‘秋收起义’的运动。我在那里的纲领，要求实现下面五点：（一）省的党组织同国民党完全脱离；（二）组织工农革命军；（三）除了大地主以外也没收中、小地主的财产；（四）在湖南建立独立于国民党的共产党政权；（五）组织苏维埃。……当时受到共产国际的反对。”^①

这样，在毛泽东身上，右边放着的与左边放着的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沾不到一块。

^① 《西行漫记》，第 140 页。

右边的是进中有退：进攻城市，在全国各中、大城市同时举行暴动，但是，不要惹恼了国民党左派，不能侵犯地方豪绅的利益……

左边的是退中有进：退往乡村，退往山区，但是，应公开亮出共产党和苏维埃的旗帜，组织起自己的工农武装，与国民党对着干……

是进是退？毛泽东的心情格外沉重。

起初，横挡在毛泽东面前的是三条大汉：

一个是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

一个是共产国际首席顾问，43岁的俄国人鲍罗廷；

一个是共产国际代表，40岁的印度人罗易。

毛泽东给他们三人排了一下队：

陈独秀，是“动摇的机会主义，在继续妥协显然意味着灾难的时刻，使党失去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线。”^①

“鲍罗廷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点，他随时准备尽力去讨好资产阶级。”^②

罗易，“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左边一点点，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③

结论：“罗易是个蠢货，鲍罗廷是个冒失鬼，陈独秀是个不自觉的叛徒”。^④

① ② ③ 《西行漫记》，第138～139页。

④ 《西行漫记》，第138～139页。

正因为这样，4月27日，当毛泽东在中共“五大”会议上，提出预防汪精卫翻脸，共产党人应紧急“上山避险”的提案时，即被他们当场否决了。

毛泽东不服。5月，他以中央农委书记的身分，在汉口召集彭湃、方志敏等各省农协负责人开会。会刚结束，何长工、袁任远就带了几个在湖南工作的同志赶到汉口，向毛泽东诉说了国民党军阀许克祥在长沙屠杀革命同胞的情景。

毛泽东一听，往桌子上猛击一掌，气愤地说：国民党军阀根本靠不住！工农武装的出路只有一个：“靠山的上山，滨湖的上船”。

毛泽东坚决要求离开武汉，前往湖南。

陈独秀同意了，让他回湖南任省委书记。

可是，仅仅十天，陈独秀又将毛泽东召回汉口，要毛泽东慎重处事，不要惹火了汪精卫，要将农民武装交给国民党，共产党的手里不要再保存武力，以“等待下次革命高潮的到来……”

毛泽东据理力争，提出三条：1. 必须坚决武装“上山”；2. 上山的工农武装必须公开亮出共产党的旗帜；3. 上山不是消极避战，更不是去打富济贫，而是为了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准备汪精卫一旦发动事变，才能有办法对付之。^①

又过了十天，毛泽东所预料的事情果然发生：

汪精卫叛变了！

① 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记录，1927年7月4日。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决定停止陈独秀的领导职务。

形势倍加严峻。毛泽东藏在汉口一间公寓里，秘密起草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湖南运动的大纲》。

换了陈独秀，又来了个“拦路虎”。

这是一位年仅 28 岁的瘦弱青年，戴着一副黑圆框近视眼镜。他就是新当选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负责人瞿秋白。

起初，瞿秋白对毛泽东的主张颇有同感。因此，当他接到毛泽东写的大纲后大为欢喜。他与在场的几位常委商议后，表示同意和支持毛泽东的计划。8 月 3 日，临时中央批准并发文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湘南特委。

毛泽东本想立即动身赴湖南，结果被瞿秋白留下了。8 月 7 日，毛泽东来到汉口的俄租界，出席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上，毛泽东再次阐明自己的观点，并明确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和彻底土地革命的主张。

瞿秋白很赞赏毛泽东的观点，与会者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瞿秋白挽留毛泽东在中央机关工作。

毛泽东摇了摇头，说：不，我要上山去结交绿林朋友，去农村开展斗争，请求中央批准。

瞿秋白无奈，他含笑将毛泽东送出门。

8 月 9 日，正要上船去湖南的毛泽东被瞿秋白召了回来，要他出席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讨论湖南秋收起义等问题。

在会上，瞿秋白宣读了湖南省委和共产国际赴长沙的巡视员马也尔向中央写来的一封信。信中提出了这样的主张：由湖

南组织一个师的军队，尾随南昌起义的军队往广东，以“与南昌军力共同取粤”。^①

“这是很错误的”，毛泽东当即对此方案提出否定，他在会上继续批评说：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在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要在湖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去。”^②

毛泽东的这番话，当即得到瞿秋白的赞同与支持。8月12日，中央任命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与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一起，去湖南领导湖南全省的秋收起义。

毛泽东急急准备启程。就在此时，瞿秋白又匆匆忙忙赶来，对毛泽东下达了一番指示：

对于左派国民党问题仍需充分利用，想办法将他们改造“成为秋收暴动的重要力量”，应在“左派国民党旗帜下”，建立“加入左派国民党人的革命委员会”；建立苏维埃问题，“目前还只能宣传，不能建立”；对于土地问题，“只能从政治上没收……”^③

说完，交给毛泽东几份“红头文件”。

这显然是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是共产国际的指示，

① 《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1927年8月9日。

② 《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1927年8月9日。

③ 参见：《四省秋收暴动的每省具体工作》、《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关于暴动问题》等。

还是你瞿秋白的主意？就要行动了，为什么又害怕了呢？……

轮船在长江摇摇晃晃地驶了两天。在洞庭湖渡口，毛泽东转乘一艘小船，又摇摇晃晃地过了两天，才到达长沙。

8月18日，长沙市郊沈家大屋里，七八个人头挨着头，正在秘密策划着一个行动计划。毛泽东脱下长衫，一手摇着扇子，一手从口袋里掏出那些“红头文件”和他那份“暴动纲领”。在座的都是中共湖南省委委员，他要让大家在这“泾河”、“渭水”之间进行选择！

纲领将决定暴动的成败，委员会都知道它的份量有多重，于是一条一条进行讨论：

起义是亮共产党的旗帜还是打国民党的招牌？委员们一致认为“国民党这块招牌已经无用”，其理由是：“国民党这个工具完全为军阀夺去，变成军阀争夺地盘的工具，国民党变成军阀党了。……国民党从前法律上承认民众很多利益，但是民众要他实现，则转眼相向，来压迫群众，民众均认为国民党是骗人的党，现在不要受骗了。”“因此湖南此次暴动，是主张用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①

关于组织共产党自己的武装力量问题，毛泽东首先在会上强调说：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没有枪杆子，谈何夺取政权，又怎能建设政权呢？^②毛泽东的这个意见会后反映到中央，中央指责毛泽东犯了“枪杆子主义”的错误。不

① 《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1927年10月8日。

② 《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1927年10月8日。

过，与会的湖南省委委员们面对着即将举行的武装起义，深知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因而得到通过。

关于土地没收的对象问题，争论比较热烈，分歧亦较大。毛泽东的理由是，“若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则没有好多被没收者，被没收土地即少，贫农要求土地的要多，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与需要，要能全部抓住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会上有的主张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有的则主张全部没收，论来论去，还是觉得毛泽东的意见合理，决定按毛泽东的意见办。

建立共产党政权和组织苏维埃问题，委员们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

纲领通过以后，几位委员不停歇地研究制订了一个详细的秋收起义行动计划。当日晚，省委将暴动计划写成书面报告，派省委委员何资深送往中央，并面告一切。报告中省委希望中央“即批准赐复，并帮助一切。”^①

中央几个常委看完报告并听了何资深的口头报告后大为恼火，当即召开会议，对湖南省委提出了严厉批评。会后，写了一封批评信让何资深带回。

湖南省委接到中央的批评信后，于8月30日向中央写了回信，并由省委书记彭公达亲赴中央，进行申辩。

袁公达1日动身。中共中央于9月3日召开湖南秋暴问题的

① 《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关于湖南秋暴办法》，1927年8月19日。

讨论会，中央对彭公达的口头申辩与8月30日的报告均不同意，而且进行了更加严厉的批评，作出了三条决定：

“一、认为湖南省委在最近紧急斗争的时期，失掉了许多在农民中发展暴动的机会；二、省委应立即坚决的遵照中央计划实行，把暴动的主力建筑在农民身上，丝毫不许犹豫；三、关于军事的调动另行决定。……中央训令湖南省委绝对执行中央的决议，丝毫不许犹豫。”^①

袁公达5日返回长沙，立即召开省委会议。

那么，湖南省委是否改变原定计划？毛泽东的态度又如何呢？

毛泽东“逼上梁山”

毛泽东认准了的就绝不退让。在起义部队攻打长沙失利后，他率然选择了上山之路。毛泽东曾说过：要感谢我们的好先生，就是蒋介石，他把我们赶到农村去。李维汉却说：毛泽东是“被迫地却是机智地上了井冈山”。^②

其实，毛泽东在彭公达启程去武汉进行申辩的时候，便离

① 《中共中央致湖南省委的信》，1927年9月5日。

② 李维汉：《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见《中共党史资料》，第5辑，第249页。

开了长沙。按照湖南省委的分工，省委书记彭公达坐镇长沙，指挥一切；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兼平浏农民师师长，到前线抓军队；易礼容任行委书记，抓各县农民暴动的配合。此时，毛泽东身上携带了一些银元作经费，他得知浏阳农军负责人潘心源在安源，因此，他决定先到安源，再去铜鼓、修水。

临行前，毛泽东对彭公达说：不管中央的意见如何，我们务必按原计划进行。时间等不得了，我必须立即见到潘心源。此时，他反复考虑的是这样三个基本问题：一是必须尽快地组织正式的军队，没有军队，起义自然是一句空话；二是这支军队必须同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这样才能发动土地革命，摧毁当地的反动政权，占据几个县，形成一个根据地；三是他已预料到这次武装起义仍有失败的可能，如果失败了就“上山”，这就有许多工作需要做在前头。至于中央的一些设想，他认为是“充满幻想”、“不切合实际的”。如按中央的意见办，“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①

此时的瞿秋白确实有些头脑“发热”，他给湖南省委下达的“湖南秋暴计划”是异常庞大的。他提出将湖南全省划为三大区同时举行暴动：从长沙为中心发动湘中暴动，以衡阳为中心发动湘南暴动，以常德为中心发动湘西暴动，然后夺取全省的胜利。毛泽东当即反对这个全省四面开花的大计划，认为这是不顾敌强我弱现实的表现。在8月30日的湖南省委会议上，他反复说明理由，强调只能组织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各县的暴动，

^① 《中共湖南省委来信》，1927年8月30日。

委员们虽原则上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但他仍有些放心不下，特别是对攻打长沙的问题。于是，他又找到省委宣传部与省工委的负责人罗章龙，罗章龙分工在长沙市组织工人暴动配合毛泽东在前方的军事活动。半个多世纪后，罗章龙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说：“毛主席走时对我说：前线的军队向长沙方向进军，等打到距长沙适当距离时，长沙就暴动。这是一个原则的决定。我们行委就积极行动，准备暴动。前方军队打到一定的地方，就送信给我们，便是里应外合，夺取长沙。”^①

进行了一番交代后，毛泽东启程了。

他先到安源召集了会议。会后，毛泽东又给湖南省委写了一封信。谢觉哉回忆说：“主席去安源布置后，将情况报告了省委，其中说，长沙不可轻举妄动，必须在三路军拿下株洲以后，长沙才能行动。随后主席赴铜鼓。”^②

这时恰逢浏阳县委宣传部长张启龙派来两位年轻的党员到安源来找省委，他们一个叫刘建中，一个叫周克明，这两个小伙子在安源偶然遇见了潘心源。潘心源说：“毛泽东在此，他和我马上去铜鼓，你们来了正好，给我们带路。”这两个小伙子十分高兴。

毛泽东当即换了一身破旧的农装，穿上草鞋，跟在后头出发了。刚走出去不远，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1977年，张启龙在谈到这次半路遇险的情景时说：

① 文家市纪念馆：《访问罗章龙同志记录》，1979年1月2日。

② 文家市纪念馆：《访问谢觉哉同志记录》，1963年7月26日。